

屯垦文化开发与边疆乡村振兴*

董向芸, 蒋晓涵

(云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指针和整体性治理的新方略, 而文化振兴亦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近年来文化发展的多元化、文化信息的繁杂化和乡土文化的边缘化, 凸显了新时代边疆治理能力提升对于乡村文化特色化建设的巨大诉求。据此, 溯源梳理新中国屯垦文化所具有的空间嵌入、关系整合和文化交融等特性, 探索屯垦文化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融创与开发路径, 有助于形成对于边疆区域乡村文化振兴的新思考。

[关键词] 屯垦文化; 乡村文化振兴; 村域空间; 屯垦戍边制度; 边疆特色

[中图分类号] F3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23)01-0083-09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3.01.009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振兴。”^①乡村文化的振兴始终是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 边疆乡村振兴战略的规划和施行要借助于乡村文化的土壤, 从文化与制度的关系上看, 文化的流传体现了现在的制度规则, 而被现实执行的制度又恰恰加固了某一种文化理念或者改变了某种文化理念, 但它最终的顺利运行或者传承都体现为其所引导的文化理性和价值选择。新中国屯垦文化也是如此, 作为屯垦制度的外在表达和孕育土壤, 其自身的发展经验和制度转化对于当前乡村特色文化建设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和借鉴意义。

学界对这一命题的研究聚焦于“乡村文化振兴”为主题的成果, 从时间层面看, 呈现较为明显的分界, 党的十九大以前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以文化自信为核心进行的内涵价值及其传播效果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之后, “乡村文化振兴”的内涵和价值研究逐渐增多, 实证层面对于乡村振兴建设中的文化空间建设和文化治理路径有着较为深入的讨论。从文化空间视域来看, 已有研究认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普遍弱化的问题比较突出, 体现为文化主体缺少、文化供给缺失、价值认同危机。^②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文化空间拓展问题, 需要加强乡村文化空间的生产动力来重构乡村文化自身的意象和美感。^③从文化治理路径来看, 乡村文化的公共性和特色化建构有着较多关注, 研究提

* **[作者简介]** 董向芸, 女, 云南昆明人,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学与边疆治理; 蒋晓涵, 女, 湖南邵阳人, 云南师范大学讲师, 研究方向为传播学与文化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新中国屯垦戍边文化资源融入边疆高校思政课研究”(20VSI08)。

①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② 陈波. 公共文化空间弱化: 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J]. 人民论坛, 2018, (21): 127-129; 韩鹏云. 乡村公共文化的实践逻辑及其治理[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8, (3): 105-113; 李少惠, 赵军义. 乡村文化振兴的角色演进及其实践转向: 基于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分析[J]. 甘肃社会科学, 2019, (5): 215-220.

③ 卢云峰, 陈红宇. 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 基于浙江省诸暨市的案例分析[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3): 211-220; 曹立, 石以涛. 乡村文化振兴内涵及其价值探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6): 116-123; 路璐, 朱志平. 历史、景观与主体: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村文化空间建构[J]. 南京社会科学, 2018, (11): 121-128.

出乡村文化传统精髓的再造和再生需要针对乡村文化载体的特点和历史积淀形成新的体系,^①在“四位一体”治理模式下夯实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创新乡村文化治理路径。^②综上,目前学界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多聚焦于现存空间中各类文化元素重组及其制度引导等方面,对于既有文化元素的梳理也多为历史延续和民族传承等方面内容,总体缺少对边疆区域中影响深远的新中国屯垦戍边文化的纳入。

一、新中国屯垦文化意涵及其边疆村域嵌合特性

溯源边疆历史,屯垦戍边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体现了历代中央政权进行边疆治理的重要国策,“历代责任边防,莫过开屯为首务”。^③而新中国屯垦戍边则以明确的国家统一维护、边疆安全保卫、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增进民族团结为其明确社会整合效用展现。^④管理学视域下的屯垦戍边,国营农场初建主要通过军队转制和军民合作而实现国家的边疆治理策略,同时以成建制的耕植方式推进村寨层面的农作能力,使得屯垦区域的军民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同时维持战斗力和经济力,强化国家的边防能力和控制力,促进当地经济社会与内地的交流,增强边疆与中央的联系。^⑤社会学尤其是社会文化发展视角下的屯垦戍边,促进了民族的交融,大多数屯垦军民留在边疆并最终融入边疆各民族之中,开发并改变了边疆的生存环境,逐步改进居住条件,许多城市据此而建,且大量屯垦军民的进出带来了内地文化,促进了边疆文化的多元融合与认同,加强了边疆文化和内地文化的交流,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促进了文化的交融交流和国家认同。^⑥由此可见,新中国屯垦戍边建设过程中所构建的文化传播与交流路径具有极强的特色,这对于当前边疆乡村文化振兴的探索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资源补充,有助于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和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拓新,且可以针对乡村振兴的文化特色化建设论题,形成更具历史积淀的路径探索。

乡村振兴以村域空间为基础载体,而村域亦可将之视为场域的一种类型。“场域(field)意涵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是一个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是充满争斗的空间。”^⑦嵌入性的制度在所嵌入的场域之中,本身就属于一种文化介入,基于原场域一贯所既有的文化网络,这种嵌入型制度无论是制度本身,还是其所构建的嵌入式空间,事实上都承载了一种与原社会秩序所不同的文化环境、文化特质,以及文化传承。因此这种嵌入性的文化不得不依靠制度来表达,或者说,为了能够使这个文化保持其原有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并且使这个文化能够在空间内维持,它首先需要各类制度进行保证。新中国屯垦文化的形

① 万军杰,王文浩.新发展阶段的乡村文化振兴:困境、方略与路径[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69-74;周立.在地化和回嵌乡土:村史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J].人民论坛,2022,(1):32-35;许丹.试论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6):28-36;赵淑清.再造乡村文化助力乡村振兴[J].人民论坛,2018,(5):139-140.

② 曹爱军.“公共文化”治理:出场逻辑与行动路向[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94-102;秦会朵,吕宾.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重塑的必要性、困境与路径[J].求实,2019,(2):98-109;范建华.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若干思考[J].思想战线,2019,(4):92-102.

③ 杨书霖.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7[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④ 孙文政,高月.中国屯垦研究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王小平.中国共产党屯垦戍边理论的形成与发展[J].中国农垦,2021,(10):19-28;罗利华.中国共产党处理屯垦戍边中民族关系的历史经验研究[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43-47.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垦局.中国农垦五十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罗利华,王玉柳.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深刻把握兵团屯垦戍边历史[J].兵团党校学报,2021,(2):56-60;王曙光.农垦体系与地方发展:市场机制下的垦地共生模式[J].新疆农垦经济,2019,(2):7-19.

⑥ 马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增进共同性”的三重逻辑[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2):34-41;徐理响,胡文婷.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团结政治探析:统一战线视角[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6):7-17;岳光,李一鸣.新中国屯垦戍边精神研究[J].经济师,2017,(6):29-30;陈国明,余彤.跨文化适应理论构建[J].学术研究,2012,(1):138-146.

⑦ 迈克尔·格伦菲尔.布迪厄-关键概念[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32-35.

成以及屯戍制度的构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屯垦制度在介入边疆乡村的过程中,基于边疆乡村文化的土壤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屯垦文化。

(一) 空间的嵌入发展

任何一种制度的产生和形成,无论是自然发生的客观规律,还是主观有意的设计,其实都是特定文化和文化轨迹需求的反映。制度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将现在个别的或者是分散的各种文化基因集约化、秩序化和社会化,并且将其外化为某一种可表达的语言与文字,进行传播和扩散,用以满足人们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新中国屯垦国营农场的构建,是基于规模化橡胶种植和其他各类农作物种植需要,先后进入了3类人员。按顺序来看,首先是20世纪50年代大批的军转干和就地屯垦戍边部队,接着是60年代大量的内地招工和移民,以及70年代的大批下乡知青。20世纪70年代之后,知青回城,国营农场陆续开始进行当地招工。从这个过程来看,国营农场所构建的嵌入型空间当中,其文化的阶段性发展是非常明确和明显的:20世纪50年代,大批的军队转业人员和部队建制的开荒转业,具有强烈的国家建设文化情怀,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当时单位制的组织建构相对来说较为容易,因为军队成员本身比较适应这样的运行体制。在嵌入空间单位制层级制构建完整的时候,国营农场开始接纳大量的移民群体,由于空间中已经初步形成了单位制交流结构,个人之间的交流以及相应层级统属关系,不仅体现于组织结构,而且也成为整个系统文化的初始特点。之后进入的移民以及下乡知青都陆续进入这个组织体制空间,逐渐融入已形成的文化氛围。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建设兵团建制的实行,使得这种组织结构及其文化结构巩固形成稳定结构。反过来说,国营农场的单位制文化自形成开始,就以制度化的形式逐渐重构了各类移民群体带来的地域文化,军队精神文化、内地移民文化以及边疆建设的国家价值判断被单位层级结构所综合,又反映到现实的组织结构当中去,通过制度结构巩固了其自身内核特质。由此,屯垦戍边制度形构了屯垦文化,屯垦文化支持着屯垦戍边制度及其所建构的国营农场的发展,并且更新和加固了屯垦戍边制度。

(二) 关系的整合适应

嵌入型的制度在这个整体的系统结构中,事实上扮演了一个重复嵌套的角色,也即在原有大的惯习场域当中,由嵌入性的制度构建出了一个小的社会结构,这个小的社会空间根据嵌入性制度的目标和宗旨,形成文化秩序和文化传统。制度则依靠这个空间当中文化的支持和运行,通过实际运行锁定制度文化结构;制度文化反过来依靠更细致的执行方式以及制度总体规则,为周围原住的民众所接受并且进行传播。当然,这个传播是多元化和多层次的,上至制度的接纳下至实际运行机构的认同,直到人与人之间交流和关系的相互影响,都可能成为相应文化传播的渠道。佐证屯垦戍边制度的发展历程,制度国营农场在区域空间中发展成熟并且开始产生相应的生产经营效益之后,其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或者说在这个企业层级建构中所形成的结构特质,事实上就对周围的区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且形成相应的文化传播路径。这种传播首先是基于经济生产方式的传播,指在制度载体按照设计开始运营并获益之后,其相应的生产和发展经验及其收益方式,都成为能够促进当地其他群体获得相应收益的重要经验。因此,能够经由本身制度生产方式等具体操作程序进行传播演示,实现生产方式技能与知识的扩展。继而,在这种生产和一般的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渐地开始拓展至技术、经验、知识、教育、卫生等群体或者个体层面的接触和交流。上述这些交流都无一例外带着原有的文化特质,例如,在边疆少数民族原本的惯习场域中,卫生观念较为落后,日常生产生活方式不够健康,相应疾病防治的方式和方法较为原始且效果有限,相较于国营农场的卫生认知而言差距较大。由此,在国营农场大量的移民进入之后,陆续成立医务室、防疫站以及大型的医院,都是为了将这个空间移民群体所认知和惯用的那种医疗卫生方式带入和扩展到被嵌入的空间领域。这种方式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现为对于健康和卫生以及诊疗的方式的改变,但是其所带入的卫生生活方式与疾病知识,极大地改变了原有惯习

场域当中的文化特质,如对于疾病的预防、疾病的产生与来源、疾病的症状与传播特性的了解,对于病患的诊疗以及对于相应日常生活的卫生行为养成等,这些认识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带动了原场域中整个意识系统和行为系统的改变。

(三) 文化的交融再塑

新中国屯垦戍边举措的选择与构建,显然与中国历史上边疆地区的屯防治有着文化关联;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了解决军队的物资供应而进行的开荒生产运动相关。虽然从制度确立形式来说,其相同之处在于都是由中央政府规划制定,并且由政府自上而下层层实施,但究其根源也可以发现,这个制度是作为整个社会秩序系统当中文化的不断发展所衍生出来的。可以说,虽然屯垦戍边制度代表了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且以单位制的结构方式获得嵌入空间的稳定建构,但其在边疆区域的维系与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基于已有边疆文化领域中,能够接受或者依据过去的经验和习惯能够理解这种空间嵌入的文化认可。尽管规则秩序的性质决定着行为秩序的安排。事实上,并非任何一种规则秩序都可以产生相应的行为秩序,只有合适的或者恰当的秩序才能满足集体的需求,集体才愿意遵从并约束其行为。纵观新中国屯垦文化建设历史进程,不仅展现了国营农场在地方的建设与辐射效应,形成对周围村寨的技术支援和经济帮扶,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区域空间内对于国家文化的传播以及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文化戍边,还有文化兴边、文化育人等方面,在边疆建设中教育的发展、学校的兴办、中华文化的传播也得到进一步彰显。面对不同的文化存在,使文化形成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乡村振兴中文化特色化建设命题与屯垦文化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化,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①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施行和推进离不开乡村文化的土壤,乡村特色文化建设不仅满足乡村群体的精神文化的需要,同时又能增强乡村文化的向心力,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

(一) 边疆区域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问题

从政策规划层面来看,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复兴涵盖了文化产业、文化育人、文化品牌3个指向,这3个方面的内容从文化赋能乡村经济、文化提升人才素质、文化打造品牌消费上都为乡村文化振兴指明了方向。进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边疆乡村地区如何结合原有复杂的地理、历史以及民族等诸多因素,实现自身现代化和特色化的发展,亦成为这些区域深入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

其一,制度空间的文化诠释薄弱。

制度的具体施行离不开文化环境的支持,离不开文化对制度要素的理解。而文化对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制度的有效和深入的实施之前自主形成了文化的保障和支持的平台,而且在于其后持续有效地形成文化的传播,通过传播形成人际关系、文化内涵的传承发展。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所有文化进化式传播过程都首先以制度变迁的形式发生。无论是以发明的形式还是以传播的行动,新的技术装置总要被结合到业已确立的组织化行为系统之中,并逐步对原有制度产生全部的重塑。”^②虽然这种看法绝对化了制度对于文化传播的作用,但从较宏观层面也可以看出,在整个文化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传播或者制度变迁的重要意义;而反过来也能够明了,制度进行文化传播的基本路径选择。正如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出的,文化系统是一个整合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单元部分或子系统都有着自己的特定角色,社会结构、制度与文化是其中重要的3个部分。制度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研究文化的整体结构,同时也只有明确了文化

^①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② 马林诺夫斯基. 科学的文化理论[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56.

的整体结构,才能找到结构实体的各个部分功能的意义。当然,每个部分的意义究其原因都是由于整体所要形成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判断,甚至于价值目标所决定的。应该说,社会结构是指文化统一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常又由社会当中的制度来支配,因此,人类社会结构的内容主要体现为社会的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相互交流的制度形式。这三者的关系构成可以大致描述为,微观的个体和宏观的社会结构,以及将这两者进行中观的连接的制度路径。以此为基础“如果我们要对自己的文明或者任何其他文明中个体的存在做一描述,就得将个体的活动与组织化生活相配置,即与盛行于该文化中的制度系统联系起来。另外,依据具体现实对任何文化的最佳描述都在于列举和分析组成该文化的所有制度”^①。可见,制度的施行依赖于文化的传播,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行尤其是文化的繁荣复兴更需要一个适宜的文化环境、文化氛围。然而在发展较为落后的边疆乡村地区,乡村社会结构伴随着时代变化在不断变迁和重构。乡村流动人口增强,使得乡村的人际关系也在不断变化,甚至出现断层,在这种情况下以人际传播为主的乡村传播形式也就出现了缩小;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结构中的“熟人社会”慢慢转为“熟悉的陌生人”,传统的乡土中国文化传播结构随之转变。这种变化使得许多制度的推行和传播影响范围不断缩减,村域群体对于各类制度的理解和推行的过程中,更加需要文化诠释与传播的助力。

其二,社会关系的文化整合有限。

文化运行过程存在着这样的一系列基本条件要求:通过制度初始运行试验各种实效可能性,经过较长时段的不断探索和试错,累积形成对于制度能够运作良好,并且获得区域认同的相关经验。由此,总体对于区域需要和区域发展的目的是明确的,但具体制度的实施方式,如乡规民约或政策建构则是制度主体的主观选择,且在这种选择中内置着主观主体在过往历史当中所累积的类属经验和价值判断。简言之,文化各种发展之目的是确定的,但文化对于制度的这种约束并不必然,也并不只有一个唯一的结果可以选择。因此,文化发展与制度发展的一致性,指的是在文化发展的各种规则当中,与理性制度建构的方向是一致的,而不是一个单方面断层的制度建构。顺承这个思路,对于嵌入型的制度而言,其最初的构建和运行实现,是由其主观选择者的价值判断,以及自成体系的文化形成与支持作为基础的。嵌入型制度以所建结构承载不同群体文化在空间内的融合,并且形成文化的制度表述。同时,制度也通过内部文化构建和外部文化的理解来支持制度的实际运行。至此,制度的文化执行表现为,在所构建的空间内空间外,对于这种制度都具有相应的认可以及对其执行的自觉性。而制度的实际执行就表现为在空间内外相关的过程中,执行主体或者受众也就是个人或群体,都对这个制度能够形成文化接纳,并且能够对其相关的行为和关系规范予以遵从。当前国家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视空前,乡村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国家乡村振兴规划2018-202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构成制度网络嵌入到乡村发展空间中。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政策的制度嵌入需要通过政策客体基于文化的理解来实现政策的实际执行,而村域主体对嵌入制度的文化内容理解和接纳程度有差异,或者说,乡村社会主体处于乡村长期生活所形成的相对半封闭的社会秩序中,多数情况下主要以原有的关系结构和文化为行为约束,对于其他文化的接受比较缓慢,这种社会秩序导致其他文化在村域的传播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受阻。因此,基于既有社会关系的乡村文化整合力就显得较为薄弱以及发展缓慢。

其三,公共领域的文化融创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

^① 马林诺夫斯基. 科学的文化理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61.

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①文化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乡村文化要实现振兴就要发挥出文化的育人功能。嵌入型的社会文化融合不仅构建了嵌入型的空间,而且也带来了嵌入型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结构,这种文化惯习与原有的惯习空间中的文化意识传统是截然不同的。为了在嵌入型空间中使相应政策的目标和价值能够完成和贯彻,且该空间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也得以保留和传承,则通过文化的融合和创新将原有群体形成一个新的标识性的文化身份,并延展为公共领域的文化空间就显得极为必要。对于嵌入制度的文化表达而言,正式制度规范或者变迁演化规则不但与文化息息相关,而且制度设计或者氛围环境也与文化有关。对此,弗洛伊德形容为“人类的决定问题在于,他们的文化发展能否并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住他们的进攻性和自我破坏的本能对他们的集体生活的干扰。”^②在群体意义上,外来文化进入某一场域时一般有两种反应:一是融入当地文化;二是保存自己的文化,并且能够使其与周围的文化避免冲突。文化如果选择的是嵌入式的传播,则既要保持文化的价值理性,同时又要避免与原有文化冲突,制度化的文化导向就显得极为必要,即当正式表述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成为群体明示的秩序规则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在区域内宣誓了这种文化存在的正当合法性,使得嵌入的文化得以相对稳定的融入并获得延续。据此来看,目前村域中各类文化的融合和创新仍有不足,使得乡村公共领域文化的总体氛围未能完全形成,公共领域文化的发展特色难以展现,存在凝聚力不够、归属感缺失等问题,也凸显了村域公共空间的文化融创的诉求。

(二) 乡村振兴与屯垦文化的联系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启动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并全面贯彻为“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文化是根本,产业是载体。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统筹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传承发展农耕文明”^③。文化产业是经济和文化的耦合,乡村振兴建设中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乡村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载体,乡村文化是产业发展的资源和根本,乡村产业是乡村文化实现效益的结果。乡村文化是中国独具区域特色的文化,深深植根于广大乡村的沃土中,大力发掘乡村文化中的乡风、乡愁、乡情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相应地,新中国屯垦文化在长期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就曾为边疆经济建设赋能,屯垦制度在边疆的嵌入过程本身也展现了文化的介入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屯垦戍边这一组织形式在每一阶段的发展都对应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借助当地优势以及文化特色进行生产和建设活动。以云南为例,云南屯垦国营农场现在依然继承着屯垦戍边文化进行相应的农业生产活动,打造独具特色的农业生产品牌。这种通过挖掘本身具有的文化特质进行产业建设的模式成为现如今实现经济效益的有效路径,对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文化产业建设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三、边疆乡村振兴中的屯垦文化开发

中华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积累和文化积淀。边疆乡村文化中蕴含着农耕文明、邻里和睦等乡土情怀,同时也蕴含着历史长河中的屯垦戍边、民族团结等家国文化。这些文化的有效融合和凝练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文化力量,也是文化育人的重要资源。而屯垦文化则以其对于边疆区域的长期实践以及在多领域的深远影响,而有着更具针对性的借鉴意义。

①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EB/OL]. (2018-03-08) [2022-12-20]. http://news.cnr.cn/native/gd/20180309/t20180309_524158347.shtml.

② 弗洛伊德. 文明及其缺憾 [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37.

③ 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文化和旅游部 教育部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开发银行) [EB/OL]. (2022-04-08) [2022-12-18]. https://view.inews.qq.com/k/20220408A0AHE900?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

(一) 借助嵌入空间加强文化的融合力

新中国屯垦最早的形式是以北大荒、新中国屯垦戍边农场这一组织形式为主;在抗日战争时期便以南泥湾的大生产开发运动、自给自足运动作为其早期发展的模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家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粮食以及各类工业生产的问题,率先在东北建立了早期的工业雏形,通过屯垦军队的转型,形成了基层国营农场的规模化生产方式。而新中国也通过国营农场这一载体体现了新中国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基层集体经济、公有制经济建设的基本探索。以此为推进,屯垦戍边进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对于边疆建设乃至全国农业生产恢复的一个重要经济推进方式。各类型的屯垦农场也以土地为基础,形成具有不同功能的以粮食生产为主、以棉花生产为主、以橡胶生产为主的国家必要物资的生产基地;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附加的华侨农场、难侨农场等。各类形式的国营农场不断涌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面临国家经济发展困顿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屯垦国营农场还给基层农村的公私合营合作化展现了其基本的模式;而同时在其后的经济发展困难时期,也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国家农村建设提供了其基本的功能平台。从而在较为多网点和多业态的垦殖合作与经济建设当中找到从业的空间,在一定时期内为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转移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分配提供了资源流动平台。应该说当时屯垦戍边国营农场建设的积极意义,至今仍影响颇深。

相应地,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变革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治理当中基层个体分散化经济以及基层经济单位的再组织,是进入信息化以来国家治理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新中国屯垦戍边的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在极为分散的个体化、基层组织经营当中,集体经济发展的凝合及其与区域社会建设的嵌合凝聚力,这种组织形态在本质上是对于更为具有凝聚力和中心力的基层社会组织的探索。在实际的发展过程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屯垦戍边建设,经历了从最开始扎根边疆、在全国全面推广建设国营农场再到企业化和集团化改革之后,各地方按照其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解散的过程。屯垦戍边国营农场不同阶段的发展,对应了每一个阶段经济时空的需要,并且从其单位制经济组织的嵌入,一直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辐射和推动,再到其通过经济渠道而传递的国家治理意志、国家文化传播的一系列他领域的扩张,也展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探索以基层经济单位制和集团化嵌入,形成对于区域尤其是边疆区域的嵌合,进而实现整体从经济到社会的整合。这一过程也为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连贯性发展提供了经验路径。

(二) 循延整合关系构建文化的创新力

从当前国家建设基本的食粮和棉花的必要物资的储备来看,其主要的供应者仍然是以国家当初所建立的国营农场在各地区的基地,尤其是在边疆所建立的国营农场基地。同时屯垦国营农场的内部也通过相应的人员单位制的建设和集体劳作的分配,工资结算等当时较为先进的工业化生产模式,形成了组织的统一利益,并且加强了基层组织合作和抱团建设的动力,依据相应的资源种植、资源加工和经营等形成和产出,成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在相对多变的外界环境和市场环境当中,基于群体的网络性连接来控制相应的风险,并且通过规模化运作和科学技术的推进对于各类作物的规模化种植和生产进行了有意的探索,基本的农业生产加工经营合作链由此完成。也因此屯垦国营农场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兼具了稳边固边的准军事和政治等多种功能。其经济功能毋庸置疑,主要是以相应的作物种植、作物种类开发以及规模化种植来形成相应的利润,并且在一定时间当中,根据国家所需进行相应适宜作物的开发。其准军事功能则突出显现于边疆区域,即通过国营农场成员组织化的相互联系和安全维护编织成一个社会防卫网络屏障,对于边境内外的不稳定因素和侵扰形成具有一定军事防卫能力的网络。同时,在政治功能发挥层面,其价值性也极为鲜明,通过定期的国家政策、国家意识、国家精神的宣传,将相应国家发展指导方针和建设理念输入到地方,并且能够有效地传达到每一个人,使得即使在边疆这一边远区域也容易把握到国家政策的核心和要义,从而为边疆的意识和文化整合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因此屯垦国营农

场其本质具有多元性,是一种以集团经济形成的社会多层面、综合效益为目标的组织建设。而在这一组织当中,各类成员能够获得较高的归属感并且从中通过该组织多元的功能展现及实现相应的经济目标,同时又发挥其对于区域社会的辐射带动功能,从而实现经济的大范围推进与区域社会发展的平衡形成更易于接受的范式带动。

(三) 藉由交融文化开发文化的辐射力

屯垦戍边国营农场在农业经济当中所建立的共享、组织和团结的价值观,体现了其对于农场这一集体的关注,同时也凝聚了农场与地方社会,尤其在边疆当中那些少数民族村寨之间牢固的交流交融关系;并且在出现较大的市场危机或是相应的公共危机时,增加了以单位形式进行稳定资源分配以及管理确定性和效率。屯垦国营农场所体现的这种较大规模的农业合作生产方式,以及对边疆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通过其在边疆社会的嵌入性扎根,而形成了其内在主动地对经济的推动和辐射,以及为周边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范式表达,表现出强大的辐射力和合作经济发展的持续力。在国营农场团结创业奋斗精神的引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边疆,尤其是农村少数民族区域的经济都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拓展,并且很快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其建立起的经济生产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其技术传播的影响力的和社会福利的功能,从而有效地分担了以农民个人或者村寨群体去参与市场竞争进行发展的市场风险。以场地群众关系来引导了团结互助,交流交融的民族友爱精神,从而开拓出在边疆社会以规模化生产组织进行引领是社会变革的社会行动。也可见屯垦国营农场是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基层合作式生产经营组织;同时它又是一个与地方社会相联系和整合的通道和平台,并且在发展过程当中较好地与地方社会形成了相互影响的共同体,依靠不同阶段经济的发展、科技的推动等各类联动活动来激发地方社会以整体空间所形成的社会团结,进而促进地方社会的整合与经济整体发展的整体效应。这种能够贴近地方社会的发展传统在这一制度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当中也不断得以展现。其经济社会综合功能的强大功能,在当前我国的乡村振兴发展当中具有较大的开发空间。

从当前我国的主要社会矛盾以及对于乡村振兴发展的主要目标来看,特别是经历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建设之后农村社会站在较长期个体化发展基础之上,面对新经济建设形势中更新更高的技术和质量要求,重新审视屯垦国营农场的社会联动机制,探索单位制组织规模化作业过程中的农业技术创新逻辑体系,为当前的发展需求形成了经验归纳与推广的前期资源铺垫。这对新时期农村社会、新时期边疆的社会治理,尤其是边疆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价值。当前就乡村振兴发展而言,针对我国对于边疆社会建设需要,基层农村社会的发展中其指引目标主要是通过乡村战略来进行农业的规模化和集中化探索。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指出:“推动乡村组织的振兴,同时以此为基础来发展壮大农业农村产业,特别是以组织为纽带形成完善紧密型利益连接机制。”^① 屯垦国营农场在此以其既有的功能和组织化发展,可以成为边疆农村发展建设当中的产业和利益连接载体,同时其原有在边疆社会与建设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也是其后建设的重要纽带。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重申和强调了乡村振兴当中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强调经济组织要发挥为农服务综合性的建设。^② 这种建设从纵向来看,从生产一直到加工和经营,通过相应供应农场进行乡村振兴的建设,成为在基层乡村尤其是国营农场资源较为丰富的边疆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命题,应该说从国营农场发挥的作用而言,不管是经济效益或是社会功能,其在生产加工和合作当中产业链的纵向完善以及横向的网络式合作经济模式,能够有效根植于地方社会,并且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引导着乡村社会从既有欣欣向荣的个体经济或村域经济扩大规模成为更大的组织力量,将原来增量增长的路径集

①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N]. 人民日报,2018-09-27(1).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N]. 农民日报,2021-04-30(2).

合形成更为有质性的更深入的科技文化的因素,探索公共的合作性生产的新兴市场模式,从而形成实质性的基层建设提升和治理现代化。

四、结论与展望

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种制度来看其具体施行,尤其是针对乡村文化的振兴,其重点是发展乡村文化的特色化、推动文化产业建设、增强主体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乡村文化的振兴离不开满足主体需要的同时能够符合社会文化发展的态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当前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流动人口进一步扩大,伴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动也带来了多种文化的嵌入与融合问题,乡村文化在加快推进多种文化融合进程的同时,也存在着制度空间的文化诠释薄弱、社会关系的文化整合有限、公共领域的文化融创不足等问题。制度的施行离不开特定的文化场域,同时文化的发展也依靠制度的保障才能繁荣兴旺,由此看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执行嵌入到村域中且关注到乡村文化的再塑与特色化,进而才能为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实践路径上的支持。屯垦文化完整展现了边疆区域空间中嵌入制度的文化支持形成,而屯垦制度的推行亦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群体或者区域长时间的文化现象与结果,就如同对于惯习场域的研究一样,它是以文化表达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屯垦文化对于嵌入型结构及其关系的建构,体现为制度推行中不断获得文化认同和诠释推广之历程,以及被现实执行制度反过来重构区域文化理念和文化特色之结果,对于当前边疆乡村文化振兴的深入推进提供了路径借鉴。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ivation Cultur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DONG Xiangyun, JIANG Xiaohan

(School of Marxism,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500)

Abstract: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 new guideline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an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s also the meaning of rural vit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disorganized cultural information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local culture highlight the huge demands of the improvement of frontier governance ability in the new era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racing to the source and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China's reclamation culture, such as spatial embedment, relationship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analyzing the path of financing and development in which reclamation culture helps rural culture revitalization, is helpful to form a new thinking on rural culture revitalization in border areas.

Key words: cultivation culture; rural culture revitalization; village space; system for cultivating and defending border areas; frontier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杨谨瑜)